

## 【个人记忆】

□戴永夏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县文化馆借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读就被这两本书吸引住了。于是,萧红、萧军这对夫妻作家,便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上高中后,我又读了萧红的《萧红选集》、《呼兰河传》和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在我对他们更加钦敬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俩的不幸遭遇: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萧军在被当成反动文人屡遭批判后,似乎也从人间蒸发,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就在两萧的名字在我记忆中尘封了近20年后的1979年,我忽然从《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萧军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得知他历经磨难后,已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返文坛。高兴之余,我立即给他写了封长信,信中谈了我对他和萧红作品的喜爱及一些粗浅体会。本来,我对这封信能否寄到并无多大把握,因为从刊物上抄的地址并不太确切。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刚寄出四五天,我便惊喜地收到了萧军的回信。在这封写满五页信纸的长信中,萧军除诚恳地跟我谈了写作杂文的经验体会外,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萧红的作品:“您对萧红的作品如此热爱,这是难得的!您对于她的作品感受和评价我认为也很深刻而正确。严格说起来,她确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诗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透明、透剔,美丽得一尘不染!从20岁她正式开始写作,到32岁逝世为止,短短十年期间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衡量,在我国女作家群中(都)是少有的人。我作为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伙伴,作为她的一个读者,是永远怀念她的……”

有了这次的真诚交流,我

## 【读史札记】

□顾则徐

中国参加一战,分军队与华工两部分。军队方面,海军有海容号巡洋舰,陆军方面有参战军与赴俄支队。参战军是边组建边训练边准备开拔,具有战略预备队的意义。参战军有三个师,其中马良第二师驻扎济南,所部已经向青岛移动、整备,随时准备从海路开拔前线。马良第二师是以山东人居多的军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投入战场,那么,首先上战场的将是山东人。中国方面在前已经投入战争的人员是华工,华工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山东人。

所谓华工,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战士。凡战争,军队能够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只能占30%-50%,其余部分需要用于后方防务和后勤;即使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也只能是部分投入战斗。一般来说,战争现代化水准越高,所需要解决后勤、工事等问题的人力就越多,直接投入一线作战的战斗员数量反而越少。一战的特点是大规模使用远程火炮、机枪、滑膛步枪、圆锥柱形子弹和飞机,因此,欧洲战场无论

## 萧军跟我谈萧红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



萧军与萧红

进一步产生了去京面见萧军、向他当面求教的愿望。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就在一个月后的1979年4月25日,我到北京约稿时,专程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鸭儿胡同的萧军家,对这位刚“解放”不久的老作家进行了采访。交谈中,他跟我谈了他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文艺界的斗争情况以及如何读书写作等。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又一次向我谈起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只有十年光景,总共创作了110万字。选集所收的文章,仅占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她虽然很有才华,但由于贫病交加,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戏称我为‘壮牛’,称自己是‘病驴’……”他还借机叮嘱我说:“所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年轻时不注意,年纪大了就容易出毛病……”

采访中,我也向他提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比如,他们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不知有何用意?萧军听后,满含深情地回答道:“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

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我称萧红‘小麻雀’,是形容她腿肚细、跑不快,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称她‘小海豹’,是说她一害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称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两只手就左右张开,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而她称我‘小狗熊’,则是因我笨而壮健,像狗熊似的……正因为我们有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采访中我很想就此问题向萧军请教,但又担心刺伤他的心,所以没有直

## 参加一战的山东人

1918年协约国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评价华工为“第一等工人,亦可为卓越之士兵”,这应该跟华工以山东人居多密切相关。

西线、东线,都发生了战前谁都没有估计到的空前伤亡,各方出现了兵员严重短缺的危机。因此,当华工投入战争,协约国就得以将后勤、工事等作业让华工承担,抽调兵员补充一线战斗。

输出华工是中国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外交和战争合作,由于中国直至1918年8月14日才正式向德、奥宣战,所以,形式就采用了商业劳务输出的方式,最重要的输入国是法国、英国、俄罗斯,此外美军也使用了大量华工。一战期间中国到底输出了多少华工,至今尚无准确数字,我估计总数应在25万人左右。这些华工基本来自山东、直隶、河南、东北、江苏、安徽、两湖、江西、两广、云南等。法国、英国及美军使用的华工不少于17.5万人,其中山东人占的比例应该不少于80%。俄罗斯使用的华工不少于3万人,以东北人为主,其次是山东人,如果考虑到当时东北人大量是籍贯山东,按照那时候盛行的祖籍分辨习惯,认为俄罗斯华工基本是山东人也完全可以。

法国招工最重要是通过

天津成立的以李兼善律师为总经理的惠民公司进行,该公司1917年8月在青岛成立由张执中负责的分公司。英国先以威海卫为中心,后来也移至青岛为中心在山东招工。俄罗斯在山东主要通过私人公司招工,以烟台为基地。即使他们在其他地区招工,由于通常是在口岸、交通枢纽实行,因此,也是以已经离开故土外出打工的山东人为首选。当然,他们在山东以外地区比如天津、浦口等地,招收到的是否真是山东人也未必,由于他们偏爱山东人,前去应招的其他地区者将自己籍贯填写为山东也有可能。

在山东本身而言,西部地区应招为华工的人较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最多是登州、莱州两府人士,这是山东最主要的苦力地区。其次是青州、沂州、胶州。西部主要集中在兖州、泰安、济南。

为什么如此偏爱山东人呢?从当时中国各地区人的体格比较来说,山东人总体上身材较高,体重较重,有“山东大汉”之称,比较适合强体力劳动。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于

接提出。只是当我无意中提到那位D·M(即端木蕻良,萧红跟萧军分手后,即与他同居)正写文章大谈当年他如何关心萧红时,萧军立即表现出对此人的鄙视和憎恶。他生气地说:就是这位自称萧红“知己”的人,当萧红生命垂危,孤单地躺在香港的一家医院时,他却弃萧红于不顾,怀资逃之夭夭,让这位女作家孤苦无告,临终前伤心地喊出:“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

停顿了一会儿,萧军又简要地谈起当年他跟萧红的关系:“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可以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也离不开谁。正如一首小令所说:‘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可是,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尽管彼此爱得很深,但我的粗犷、爽直、强梁的个性常使她那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这段话,可谓他们共同生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们悲剧人生的冷静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感情的裂变,早已埋下了种子;而他们痛苦的分手,似乎也在所难免。诚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所言:

生离死别已吞声,  
缘结缘分两自明!

早有《白头吟》约在,  
陇头流水各西东。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

话说张僧繇画过一幅《醉僧图》,到了初唐,都过了快一百年了,道士们还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有些僧人就凑了几十万钱,雇大画家阎立本画了一幅《醉道士图》,以此作为反击。自唐以后,阎立本作《醉道士图》的典故成为画坛佳话,到今天我却看出一些可疑:张僧繇的《醉僧图》何以成为道士们的笑柄?

从画而论,《醉僧图》必是百代宗师张僧繇的一幅佳作。他画龙点睛的故事就不必说了,根据史料记载,张僧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独创,他吸收天竺的画法,画出的画具有立体感。他还创造了一种不用轮

## 【宣纸上的故事】

## 一僧一道一帝王

□李北山

廓线的“没骨”法,全用色彩画成,改变了顾恺之、陆探微以来瘦削的人物形象,创造出比较丰腴的造型。张僧繇独出心裁,在技法上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从社会环境而论,当时的梁武帝崇佛,全社会都尊崇佛教。据说全国的很多佛院寺塔,皇帝都命张僧繇作画。皇帝点赞,大师很忙,《续画品录》说他“俾昼作夜,未曾厌息,惟公及私,手不释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可见天才都有痴处。只要让他画画,累死都愿意。作为皇帝的御用画师,张僧繇当然不会讽刺佛教,相反,这样一幅《醉僧图》必是歌颂之作,大概是书写僧人的率性天真。

如此看来,道士为什么要以这幅《醉僧图》来讽刺和尚们呢?我想他们讽刺的,不是因为画中的和尚喝醉,而是画中的和尚本人,一定是张僧繇所画的这个和尚给历史留下了笑柄。那这个和尚是谁呢?我的猜想,是一个叫樛头师的和尚。

梁武帝萧衍对围棋如醉如痴。因为崇佛,他自然和很多高僧有往来,有一个名叫樛头师的和尚,佛法精进,他非常敬重。一天,他下教召樛头师入官研讨佛法,樛头师到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正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一听,就把樛头师给拉出去杀了。下完棋,梁武帝问樛头师怎么还没来,侍从回答说已奉旨杀了——估计这樛头师是史上死得最冤的和尚。

可见,道士们笑话的不是樛头师喝醉,甚至也不是樛头师本人,其实笑话的是一个大师却被最笃信佛教的皇帝给杀了,这对佛教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那么,僧人们凑钱请阎立本画了一幅《醉道士图》作为反击——如果说和尚喝醉还有点惊世骇俗,那么道士喝醉实在是平常,甚至道士喝醉是风尚,怎么能够反击那些道士呢?一样的道理,他们请阎立本画《醉道士图》,一定也是画的某人,他们笑话的也不是道士喝醉,而是这个道士本人留下了笑柄。那么这个道士是谁呢?我猜是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是著名的道士,茅山派的创始人,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深远,关键是他是梁武帝萧衍的好朋友。他们早年相识,萧衍称帝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弘景却隐居茅山,不出仕,但和梁武帝书信不断,朝廷大事都找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尽管和皇帝是好朋友,但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的代表人物,却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自誓受戒,修道兼修。有学者考证认为,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试想,一个道教宗师,皇帝面前的红人,却落得“自誓受戒”的下场,这于道教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因此,和尚们请阎立本画的《醉道士图》其实是画的陶弘景,以陶弘景的遭遇来揭道教的伤疤。

樛头师与陶弘景,一僧一道,同一个皇帝面前的红人,一逝一隐,被两大大师画入历史的一场宿醉之中,留下那些掌故、这些故事。画已不存,却依然给我们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文化魅力。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

(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